

# 19世紀40年代前期 英國強佔澳門幾次主要侵略活動

張運華\*

澳門在16世紀30年代被開闢成貿易港口後，成為中國最早的開放城市，但不久即被葡萄牙人竊據，並一度壟斷了中國的對外貿易。這種狀況引起了其他海外殖民者的覬覦，隨着葡萄牙人在東方霸權的日趨衰落，亞非等殖民據點的相繼喪失，許多國家都企圖奪取澳門，並以澳門作為侵略中國的基地。當時號稱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強國的英國就充當了這支侵略大軍的急先鋒，急不可待地要利用澳門為侵華戰爭做準備。為達此目的，僅在19世紀40年代前期不足四十年之間就幾次企圖強佔澳門。

英國對澳門的圖謀早在17世紀就已經開始。1633年，在果阿總督的親自批示下，英屬東印度公司派出軍艦倫敦號前往澳門，此行得到居澳葡人的接待，並協理他們同中國進行貿易。英國希望通過澳門在中國取得一個立腳地，並且和中國直接貿易。就在這一年，英王查理一世派出以約翰·威德爾上尉為艦隊指揮官的商業艦隊前往中國，這支商業艦隊由四艘軍艦和兩艘小船組成，手中持有英王致果阿總督和致澳門總督的信。1637年英國海軍艦隊進入澳門水域，利用葡人在澳門和廣州順利地與中國進行貿易，但就在這次貿易過程中，英國艦隊攻佔虎門炮臺，掠奪大炮和船隻，扯下中國國旗。後來在中國政府的嚴正抗議下，英國艦隊被迫歸還搶奪的炮臺、大炮和船隻。18世紀，英國又多次謀求澳門貿易，但都被中國政府拒絕，尤其是1793年9月，英國特使馬戛爾尼正式要求清政府給予“海島一處”的荒謬要求被嚴正拒絕後，此後的十多年間，英國兵船曾幾次“企圖搶奪澳門”<sup>(1)</sup>。

為了謀求澳門貿易，打破葡萄牙人對澳門的壟斷權，達到強佔澳門的目的，隨着英國成為世界一流的殖民強國，英國對澳門的強佔活動也變本加厲，在19世紀40年代前期不足四十年，據不完全統計，英國對澳門的侵略活動，犖犖大者就有六次。

第一次侵略澳門的活動發生在1802年。這一年英法聯軍入侵葡萄牙，趁此機會，英印總督威里斯立（Marquis Wellesley）藉口防止法國佔領澳門，派遣軍艦六艘，兵員數千駛進澳門水域，他們的理由是：“由於這一侵略的結果及葡萄牙所處的地位，曾考慮到法國的步驟，有理由預料法國戰艦將在印度海面出現，準備進攻不列顛及葡萄牙在印度的領地。於是，（英國）決定派軍隊支援葡萄牙，並幫助他們保衛澳門。”<sup>(2)</sup>面對英艦，駐澳葡人驚恐不已，不願英艦入澳，立即向廣東政府“懇求保護”，儘管“中國當局對於英國遠征軍意圖佔領澳門並驅逐葡萄牙人表示驚訝”<sup>(3)</sup>，但時任兩廣總督的吉慶遂飭令洋商諭英國人離澳回國，並奏報朝廷說：“居住澳門之大西洋夷人稟稱，有英吉利夷船灣泊零仃洋，距澳甚近，欲登岸借居夷房，恐其滋事，欲求保護。當即飭諭英吉利夷船回國，毋許登岸。澳門情形安靜。得旨：有犯必懲，切毋姑息，無隙莫擾，亦勿輕率。”<sup>(4)</sup>與此同時，葡人還一方面向在清政府供職的欽天監監正兼北京葡萄牙主教湯士選（Dom Fr. Alexandre de Gouveia）請求援助，另一方面澳門治安判事歐威得（Ouidor）又將英人窺伺澳門之事函告北京葡籍耶穌會索德超（José Bernardo de Almeida）請求支援。湯士選、索德超兩人獲悉情況後，立即向西洋堂務內務

\* 張運華（1964-），教授，先後就讀於湘潭大學和西北大學，獲學士和碩士、博士學位。現於廣東五邑大學五邑文化與華僑研究室從事研究工作。

府大臣、工部侍郎蘇楞額稟呈，申述這是英國圖佔澳門的陰謀，其步驟與英在印度同出一轍。湯、索在申述中說：“（英國）素號譎詐，近數十年來，常懷吞食之志，往往外假經商之名，遂其私計……前於乾隆五十八年曾遣巨舶進貢，多所求假，不惟便其通商，且求海嶼一所，作久留計。幸蒙高宗純皇帝洞其隱曲，未遂其私，悵悵而去。渠因未得所求之故，終不撒手，每有窺伺之意，……英吉利之凶狡，在西人無所不知。”<sup>(5)</sup>英國人對葡人這種言行十分惱怒，但後來由於英法兩國戰事平息，英國兵艦也失去繼續停留澳門的藉口，祇好離開澳門。但英國人為了消除中國政府的“誤解”，消除葡人的言行給他們帶來的不良影響，還在事後兩年即1804年由東印度公司致函兩廣總督倭什布及粵海關監督延豐，反復申說他們此次來澳的目的純粹是為了“保護澳門免遭法國侵佔，別無他意”。儘管英艦已經離開了澳門，但澳葡當局心有餘悸，唯恐英國人捲土重來無力抵禦，於是再三懇求清朝“皇上預為保護”<sup>(6)</sup>。

第二次侵略澳門的活動發生在1808年。這次侵略活動造成的影響較大，它是由英、法、西等國之間的“半島戰爭”而引起的。1808年，法國拿破侖十萬大軍挺進伊比利亞半島襲擊西班牙，爆發“半島戰爭”。交戰各國盲目向各方面攻擊，葡萄牙本土淪亡，王室貴族在英艦救援下流亡巴西。於是，英國人又“舊病復發”，再次企圖侵佔澳門。1808年，英印總督閔多(Lord Minto)派遣海軍上將度路利(William Brian Drury)率領戰艦十艘、海軍三百人遠征澳門，英國人的侵略氣焰十分囂張。當英艦從印度出發時，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會就狂妄地叫囂，祇要從葡萄牙方面得到許可，他們就不必再顧慮中國政府的阻撓。當英艦來到澳門海面時，海軍上將度路利公然向中國官員表示，它所率領的艦隊來澳門的目的是執行保護澳門、幫助中國政府剿滅海盜、防止法國人佔領澳門的使命，並上書兩廣總督：“今我國王發此戰船來澳，為幫助澳門西洋人。今稟知總督大人，本國兵船灣泊澳門，防備法蘭西來澳，以備禦敵。因澳門西洋人微弱，故此着些夷兵上岸，好幫扶西洋人……情願將此兵船代天朝効力。”<sup>(7)</sup>不久，英軍在澳門強行登陸，以二百人入三巴寺，一百人入龍嵩廟，二百人踞東望洋，一百人踞西望洋，最後佔領媽閣廟等地，從而佔

領澳門。面對英國的侵略活動，駐澳葡人未作任何反抗。但中國政府認為澳門是中國領土而非葡萄牙屬地，葡萄牙無權“轉讓”澳門，英國也無權“保護澳門”，警告英國人“即速撤兵開帆”，“若再有延挨不遵法度”，“當調集大兵前來圍捕”<sup>(8)</sup>。當時，兩廣總督吳熊光、廣東巡撫孫玉庭聞訊，即派廣州知府福明、副將張瑗前往曉諭，飭英軍退出澳門。但英人不僅不退出澳門，反而從印度調來援兵，對中國進行武力威脅。吳熊光下令所有英船即日撤離澳門，並禁止貿易，斷其買辦。度路利不從，反親率戰艦三艘，逕趨虎門，進泊黃埔港。後來又帶領夷目十餘人，夷兵四十多人，水手二百多人，駕駛三十餘隻，由黃埔至十三行停住，求見兩廣總督。吳熊光拒見，令其回黃埔候旨，同時上奏嘉慶帝。旨旨至粵，飭令英人“撤兵開帆，不可停留，倘有不遵，統兵剿辦”<sup>(9)</sup>。於是，吳熊光檄調督、撫、提、鎮各標官兵2,600人，派參將張紹緒、寶興，游擊祁世和，守備李福泰等管帶，在黃埔及澳門駐紮防守。由於中國方面態度堅決，準備充份，英艦被迫從澳門撤走。它佔領澳門的企圖又一次失敗了，但澳門葡人則以六十萬圓犒賞英軍。

事件平息後，嘉慶帝將吳熊光革職，命永保為兩廣總督，韓封為廣東巡撫，並嚴諭核查吳熊光有無辦理不善之處。後永保卒於赴任途中，改由百齡代之。嘉慶十四年，百齡赴粵。查實英兵確有覬覦澳門之情，奏劾吳熊光辦理延誤之罪。於是吳熊光被嘉慶帝流放伊犁。

這次事件，使清政府對澳門的防範措施進一步加強。1809年4月，清政府派遣廣東巡撫韓封視察澳門防務。韓封認為英國“最為強悍”，“難保其去不復來”，必須加強澳門防務，常備不懈。於是廣東政府決定增加關駐軍數量，又在澳門北部的蓮花峰和西北部的青洲分別建造炮臺。為防備英軍從嘉思蘭炮臺至西望洋炮臺以南一帶爬越低矮的石牆佔領澳門。韓封要求澳葡當局將石坎在原有的基礎上再增高4-5尺，並加築一條圍牆。葡人對此不勝喜悅，表示“當刻期興工”<sup>(10)</sup>。

英國人對澳門的這兩次侵襲，都以防止法國人入佔澳門為口實，這一方面反映了西方殖民國家在進行海外掠奪中的相互矛盾，更主要的還是英人“見西洋人不納貨稅，獨得便宜，垂涎已久，今適值西洋微弱，即揚保護之名，伺圖佔據”<sup>(11)</sup>，但始終未能如願。

第三次侵略澳門的活動發生在1829年。直接導火索是“商欠”。所謂“商欠”是資本主義的英國對華早期侵略的一種形式。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沒有像近代一樣的金融信貸制度，一些資本薄弱的中國行商缺乏可以周轉的資金，在銷售了外國貨物之後，不能及時籌款歸還；而外國商人則樂於不收欠款，以高利息借給行商，幾年後一併結算，利上加利，商欠驚人，外商時常逼債。清朝廷雖再三下令嚴禁行商借債，但令出不行。1829年，中國公行連年虧損終致倒閉，拖欠英商不少貨款，其中行商劉承澍的欠款就達一百萬元。逗留澳門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特別委員會主席布魯東（William Henry Chicheley Plowden）奉命向中國方面交涉，並派遣軍艦停泊於珠江口外，對清政府強逼要挾，要求修改有關貿易章程，聲稱如所求未遂，即不與中國貿易。兩廣總督李鴻賓看到雲集於澳門海面的大量軍艦，擔心英國人重演1808年擁兵登岸圖佔澳門的一幕，急忙與水師提督李增階進行軍事佈置，令駐防於澳門一帶的香山協提標中營、左營、大鵬營的官兵“不動聲色，整齊防備”<sup>(12)</sup>，隨時做好戰鬥準備，進入戰備狀態，使澳門一帶呈現外鬆內緊的態勢。雙方一直相持到第二年春天，英國商人見清朝政府堅持不作重大讓步，祇得同意商欠抵得入口貿易，使這場衝突以劍拔弩張而始，和氣生財而終，得以和平解決。

第四次侵略澳門的活動發生在1830年。它肇始於英國人違背清政府制定的“外國婦女不准前來廣州”的規定。為了加強對外國商人的防範，清政府早在廣州設立海關，允許外國商人進入廣州進行貿易初期，就有外國婦女不准進入廣州祇能留住澳門的規定。但1830年，新任英國東印度公司特別委員會主席盼師（William Baynes）卻公然違反這一規定，攜帶妻子及葡籍婢女到達廣州。廣東官府按照規定，要將“番婦”、“夷婢”驅逐回澳，盼師竟令水兵將大炮搬入廣州商館，準備同清朝軍隊對抗。兩廣總督李鴻賓等示以兵威，迫於壓力，盼師祇得讓妻、婢返回澳門。

事後，有官員將“英夷”“動違禁令”，以及在澳中國居民“半通夷語”其中容易“藏奸”的情況向道光帝陳奏，道光帝下達了“逐款嚴密訪查”的密旨<sup>(13)</sup>，接着令廣東官員進一步加強管束外國商人，對以前“防範外夷”的章程進行修訂。新章程規定，各國“夷商”一俟貨銷事竣，不論何時，“即行隨船回國，或

前往澳門居住，不得無故潛留”，還規定葡萄牙婦女在受僱於外國婦女後，祇准在澳門居住，不得潛往廣州，如有違犯，就惟澳葡當局是問。<sup>(14)</sup>由於有了這一紙欽令，在以後的十來年中，再也沒有發生過葡籍婦女進入廣州的事件。

第五次侵略澳門的活動發生在1834年。這次事件給澳門製造了軒然大波。1833年，英國國會取消了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的壟斷權，派遣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為英國駐廣州商務總監督，行使以前東印度公司派出的“大班”的職責，處理英商在廣州的各種事務。1834年7月，律勞卑抵達澳門，在將妻子、女兒安頓在澳門後，違反歷來既定的章程，擅自來到廣州，要求面見兩廣總督盧坤。盧坤以其與舊例不符，令行商們勸律勞卑離開廣州返回澳門。因為以往中英貿易從來都是由中國行商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大班相互交涉，政府從來不出面，更沒有英國官員進駐廣州直接與清政府交往的先例，對盧坤的要求，律勞卑斷然拒絕，堅持要見總督。為防止事態的擴大，盧坤決定通融折衷，派廣州知府等三名中國官員前往律勞卑駐足的商館，詢問其身份和此行的目的。律勞卑態度蠻橫，不僅不說明來意，還不肯令通事轉傳言語，並公然指責前來會見他的中國官員。律勞卑又命令兩艘英國兵船闖進黃埔，企圖挾武以自重，威迫清政府就範。

針對律勞卑的挑釁和囂張氣焰，盧坤忍無可忍，立即下令停止中英貿易，封鎖廣州與澳門之間的交通，並調兵遣將，加強澳門地區的防務；命令陽江總兵何岳鍾率領水師赴澳門附近洋面巡察，命令梧州協都司王錦繡帶兵三百名赴澳門協同防守，命令香山協副將秦裕昌、署大鵬營參將鄧旋明與澳門同知等妥為預備，並率兵入澳幫助葡萄牙人防守炮臺。中國軍隊的大規模行動，使澳門充滿驚愕恐怖的氣氛，呈現臨戰狀態，戰爭的陰影籠罩在澳門上空，戰爭如在弦之箭一觸即發。面對這種態勢，原來被英國人僱傭的通事、買辦、僕役等惟恐被指為通敵的漢奸，全都逃避他去，英國人也因入澳的中國士兵闖進他們的住宅而大為驚恐。但澳葡當局卻不願讓中國軍隊入駐他們的居留地，於是就以“極為恭順”的態度向廣東官府表示，“情願自行防守，斷不肯任英夷佔據，自失世守之業”<sup>(15)</sup>，進入澳門的軍隊便旋即退出。英國人對澳葡當局的所作所為，大加贊賞，稱之為“十分恰當”<sup>(16)</sup>。

後來律勞卑在清朝廷恢復貿易的條件下，撤走軍艦，自己返回澳門，不久即病死於澳門。後來，有人借機上奏朝廷，要求將澳門的炮臺、炮位拆卸銷毀，將“番梢”即外國士兵盡行驅逐回國。道光帝下旨令廣東文武大員確切查辦。經過仔細調查，盧坤與閩省文武大吏聯名入奏，認為前奏並非完全實情，並請求朝廷免予拆毀葡人修築於明代的炮臺，免予驅逐在澳的葡萄牙士兵。道光帝應允了這一請求，居澳的葡人才未因這次事變受到更大的牽累。

這次事件顯示出中英之間的矛盾已經十分尖銳。

第六次侵略澳門的活動發生在 1838 年。當時，英國政府派遣東印度艦隊總司令馬他倫（Frederick Maitland）少將率領兩艘軍艦來華保護鴉片貿易。馬他倫於 7 月中旬抵達澳門後，立即要求面見廣東大吏。廣東官府根據“夷官”“尤不得允留粵海”的制度，命令他立即離開澳門。對這一命令，馬他倫拒不服從，還率領三艘軍艦在穿鼻洋面向清政府示威。當時，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等一方面在廣州地區佈置兵力，加強防務。同時，鑒於馬他倫的妻子、婢女都留居澳門的情形，又剷令香山縣令、香山協副將馳往澳門，與澳門同知並力駐守，並秘密通知葡人“毋為英夷所惑，一體加以防護，以期有備無患”<sup>(17)</sup>。後來，馬他倫害怕清政府採取封港等措施，從而給英國商人帶來更大損失，沒敢挑起武裝衝突。

如果說以前兩次對澳門的侵擾還有着抗擊法國的幌子的話，那麼，後來的四次侵擾活動則是直接針對中國政府，用武力公開對抗中國政府，破壞中國的主權，嚴重威脅中國的安全。

綜觀 19 世紀 40 年代前期英國強佔澳門的六次主要侵略活動，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隨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增強和通過與中國頻繁的經濟交往，對中國的經濟水平、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等方面的瞭解，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急於用武力打開中國大門，企圖把中國變為它們的商品市場和原料基地，變為它們的殖民地。這樣，澳門就成了這些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侵略中國的跳板。

第二，英國殖民者對澳門的爭奪，是其殖民事業的組成部分。從明崇禎九年（1637）起，英國就以侵

佔澳門為目標之一，籌謀在中國沿海佔領一個海島開始，經過二百零五年乃至二百六十一年（至租用“新界”）的侵奪，最後佔領了香港，而且也祇是在其佔領香港後，對澳門的爭奪才告罷手。這是它加緊向東方擴張的必然結果。

第三，英國等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圍繞着澳門所展開的激烈的“商業戰爭”和“殖民戰爭”，儘管各有勝負，但就總體而言，他們都是獲利者，而把災難、禍害留給了中國。因為澳門雖然仍被葡萄牙人佔領，但英國等國家卻從侵佔香港等事件中獲得了更大的利益，而這種利益對他們本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勃興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第四，英國等西方殖民主義者對澳門的侵略活動，政治上嚴重地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治權，經濟上隔斷了中國與南洋各國長期以來的傳統友好貿易，並影響了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水平。

第五，面對着英國企圖用武力打開中國的大門，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的危急關頭，清政府仍然墨守成規，做着“天朝上國”的美夢，渾然不覺一場危機深重的災難即將來臨。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對英國人的武力侵略僅作了一些戰略防禦的準備。清政府雖然十分警惕外國“夷人”的侵略活動，還一再制訂防範“外夷”的章程，但祇注重限制外國商人在廣州的侵略活動，預防外國軍隊入侵中國城市，對英國人利用澳門為侵華戰爭做準備的動向沒有引起高度的重視，從而對英國人利用澳門所進行的一系列侵略活動沒有採取果斷的查禁措施。距英國人對澳門最後一次的主要侵略活動不到兩年，清政府就為嚴守這種“閉關鎖國”政策造成的鼠目寸光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中國民族也由此遭受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深重災難。

#### 【註】

- (1)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二)。
- (2)(3)(6) 轉引自姜秉正：《澳門問題始末》頁 67，法律出版社，1992 年。
- (4) 《仁宗聖訓》，第一〇七卷，頁 2；《東華續錄》第十三卷，頁 12。
- (5)(7) 《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一) 頁 11-12。
- (8) 《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三) 頁 24-25。
- (9)(11) 《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二) 頁 34。
- (10) 《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三) 頁 7-8。
- (12)(13)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一) 頁 162；頁 76。
- (14)(15) 梁廷枏《粵海關志》卷 29，頁 21；卷 27，頁 27。
- (16) 廣東省文史館譯：《鴉片戰爭史料選譯》頁 28，中華書局，1983 年。
- (17) 《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 卷 4，頁 100。